

比较政治研究丛书

.....

丛书主编

高奇琦

Comparative Politics

Discipline, Issues and Methods



比较政治学

学科、议题和方法

高奇琦 / 著

比较政治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高奇琦

比较政治学

学科、议题和方法

高奇琦 / 著



Comparative
Politics

Discipline, Issues and Method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政治学:学科、议题和方法/高奇琦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比较政治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13515-4

I. ①比… II. ①高… III. ①比较政治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7504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比较政治学:学科、议题和方法

高奇琦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242,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515-4/D·2789

定价 38.00 元

比较政治研究丛书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 拓	中国政法大学
查尔斯·拉金	加利福尼亚大学爱尔文分校
冈特·舒伯特	德国图宾根大学
林尚立	复旦大学
庞中英	中山大学
桑玉成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谭君久	武汉大学
吴志成	南开大学
肖逸夫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
杨雪冬	中共中央编译局
俞可平	北京大学
张小劲	清华大学
钟 杨	上海交通大学

本书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华与罗世界文明与比较政治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14AZD133)的阶段性成果。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节 国内比较政治研究现状述评	1
第二节 基本思路和方法	3
第三节 内容与结构	4
第一章 比较政治的方法综论	7
第一节 比较方法的基本逻辑与学术史	7
第二节 从单因解释到多因分析:比较方法的研究转向	21
本章小结	31
第二章 比较方法的质性特征	40
第一节 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质性方法	40
第二节 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	51
第三节 类型学研究:以东亚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为例	63
本章小结	75
第三章 比较政治的学科与议题	85
第一节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比较政治学的几点思考	85
第二节 制度自信与比较政治学体系的构建	98
第三节 比较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的二元互动	111
本章小结	129
第四章 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	142
第一节 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路径的趋近	142

第二节 交叉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路径·····	162
本章小结·····	173
附录一 比较与误比·····	189
附录二 质性方法与比较政治·····	202
附录三 理性选择理论与比较方法：一个正在出现的综合？·····	219
参考文献·····	230
后记·····	254

引言

第一节 国内比较政治研究现状述评

从改革开放后的整体发展来看,中国比较政治学实际上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考虑到之前的研究基础极为薄弱,同时比较政治的研究操作又非常困难,所以中国的政治学者能够取得目前的成绩实属不易。近年来,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在中国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比较政治研究机构的成立。2003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开设比较政治系,这是国内第一个以“比较政治”命名的大学科系;2003年12月,武汉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成立,谭君久担任中心主任;2008年2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成立,李路曲担任院长,该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就将研究重心定位为“比较政治”;¹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成立,杨光斌担任所长;2009年,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全面重组,张小劲和景跃进分别担任系主任和副系主任,该系的研究重心也是“比较政治”;2012年3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许振洲担任系主任;2012年5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成立,陈明明担任中心主任。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表明中国比较政治的研究队伍正在不断扩大和充实。

第二,比较政治研究刊物的建设。2010年12月,李路曲主编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该辑刊是国内第一份以“比较政治”为关键词的系列辑刊,之后按照每年1—2辑的速度出版(到2015年1月,该辑刊已经出版7辑);2013年4月,杨光斌主编的《比较政治评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每年出版2辑;2013年7月,高奇琦主编的《比较政治学前沿》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

1 辑；²在这三本辑刊之外，³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也纷纷为比较政治开设专题栏目或发表论文，这些刊物包括《政治学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国外理论动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这些辑刊和刊物为中国比较政治学者提供了交流成果的重要平台。

第三，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召开。2010年5月，《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共同举办“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第一次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⁴2011年，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举办了3次，分别在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和深圳大学举行；⁵2012年，比较政治的主题会议增加至5次，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举行；⁶2013年，比较政治的主题会议举办3次，⁷其中一次为国际会议，主题为“第一届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办；⁸2014年，比较政治的主题会议举办了3次，⁹其中一次为国际会议，主题为“比较政治研究：现状、前沿趋势和中国”，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这些会议出现了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从学科性大会向具体议题转变；二是国际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

在机构、刊物和会议之外，其他的一些工作也在深入开展。例如，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建设和维护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政治研究数据库网站“比较政治研究网”(<http://psi.ecupl.edu.cn>)，编辑了《比较政治学通讯》电子刊物(每月一期)，并创设和维护了比较政治研究的微信公众号(bijiaozhengzhi)，这些新的沟通平台都会定期更新国内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新动向和新成果。

尽管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也存在如下不足。

第一，比较方法的方法论意识还有待继续加强。因为比较政治是一个以方法来命名的学科，所以研究方法对于比较政治而言非常重要。近年来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论意识在增强。许多比较政治研究者都开始强调比较方法：杨光斌在《比较政治评论》第一辑的文章中特别强调，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是运用比较历史分析；¹⁰唐睿和唐世

平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的文章就充分运用了国际上比较前沿的质性比较分析(QCA)。¹¹然而,能够娴熟和到位地使用比较方法的成果还是相对缺乏。同时,研究方法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提出或证实理论,所以将方法和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成果则更加缺乏。李辉等人指出的“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就是指向这一点。¹²

第二,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国际化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国内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真正经典的作品需要结合目前国际上比较方法的前沿进展,并对国际和国内的现实问题作出有效的回应。也只有产生类似《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这样的经典作品,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学科才会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影响和学科地位。虽然近年来以“比较政治”为关键词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呈上升趋势,并且受过国外严格的方法论训练的海归比较政治学者也在不断增加,然而,到目前为止,就笔者掌握到的资料而言,中国大陆学者在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Comparative Politics* 这些重要的国际比较政治学期刊上的论文发表还非常少。¹³因此,国际学术圈亟须中国学者发出声音,以提升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二节 基本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便是基于上文提及的两点内容展开。第一,因为比较方法在比较政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国学者需要对比较方法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第二,要进一步提高比较政治研究成果的质量,需要中国学者对比较政治的学科特征和研究议题进行反思和规划。笔者在本书中尝试对这两点进行讨论。

本书的基本思路如下:首先对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进行整体性的讨论;其次对比较方法中最重要的质性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并尝试对比较方法中的概念研究和类型学研究进行着重讨论;再次,笔者对比较政治的学科发展进行宏观的讨论,并尝试以国家治理为核心讨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议题;最后,笔者将议题锁定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

又研究上,尝试在两者的交叉研究中寻找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可能突破点。

本书主要采用如下三种研究方法:第一,文献法。对比较方法的介绍性研究主要基于国内外大量的相关文献。第二,归纳法。在对一些整体性的特征(如比较方法从单因解释向多因分析的研究转向、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路径的趋近等)进行总结时主要运用这一方法。第三,规范分析。笔者在对一些问题进行宏观把握时运用思辨性的规范分析方法,如将多因分析的转向与科学哲学的整体变迁趋势结合起来,再如强调国家治理范式对西方主导的民主转型范式的替代和调和作用。

第三节 内容与结构

全书的内容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和第二章讨论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比较政治的学科与核心议题。

具体来看,第一章主要对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进行整体性的讨论。第一节首先就比较方法的控制逻辑、比较对象的选择以及比较方法的学术史进行粗略的梳理;第二节则对比较方法从单因解释向多因分析的研究转向进行了归纳性总结。

第二章着重讨论比较政治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质性方法。第一节梳理和总结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质性方法;第二节对比较研究质性方法中最重要的概念分析展开讨论;第三节则对比较研究中另一重要的质性方法——类型学分析——进行探讨,并以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为题对这一方法进行尝试性的运用。

第三章对比较政治未来的学科发展以及核心议题进行轮廓式的分析。第一节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讨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的可能思路;第二节主要对制度自信与比较政治学体系的构建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第三节以国家治理为核心议题讨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可能的突破路径。

第四章对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领域(将这一交叉研究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进行探索性的研究。第一节对比

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路径趋近的趋势进行分析;第二节则对交叉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进行较为深入的归纳和展望。

在这四章之外,笔者还在附录部分编译三篇国外学者对比较方法的讨论文章。这三篇文章在国外比较方法领域是转引率非常高的文献,其对比较政治的特征及其要义都有深入的分析。这三篇文章的编译由笔者独立完成。

注释

1. 2012年4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更名为政治学研究所,高奇琦担任所长。2015年6月,政治学研究所重新更名为政治学研究院,高奇琦担任院长。

2. 该辑刊的特色是国外经典文献的编译,每辑主题集中。第一辑为“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2013年),第二辑为“比较政治中的概念研究”(2014年),第三辑为“比较政治中的质性与量化之争”(2015年),第四辑为“比较政党政治”(2016年待出版)。

3. 最近,天津师范大学的中外政治制度学科也在筹划出版比较政治学方面的系列辑刊。

4. 邢瑞磊、王金良:《“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126—128页。

5. 2011年6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主办第二届“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2011年12月,武汉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办“比较政治与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2011年12月,《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共同主办“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比较”学术研讨会。参见阙天舒:《比较政治学的范畴、方法与逻辑——第二届“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会议综述》,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58—160页;杜剑:《“比较政治与政治文化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陈家喜:《拓展比较政治研究的主题与视野——“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比较”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122—123页。

6. 2012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举办了“比较视野下的国家建设与民主”学术研讨会;2012年6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比较政治研究上海青年学者论坛2012年会议”;2012年8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举办了“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研讨会;2012年10月,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和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合办了第四届“比较政治学论坛”;2012年11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了“比较政治理论的发展与反思论坛”。参见徐海燕:《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载《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90—94页;阙天舒:《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逻辑、路径与问题情境——“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152—154页;陈媛:《中国政治发展与比较政治学——第四届“比较政治学论坛”会议综述》,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6期,第215—219页。

7. 2013年8月,《民族研究》编辑部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举办“比较视野下的民族与族群政治研究学术研讨会”;2013年11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比较政治学:全球视野与中国议题”学术研讨会。参见马俊毅:《比较视野下的民族与族群政治研究学术研讨会》,载《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第121—122页。

8. 该会议邀请了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教授彼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托斯滕·佩尔森(Torsten Persson)等国际上一流的比较政治学者参加。

9. 两次国内会议分别如下:2014年10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举办“比较政治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2014年11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比较视野中的政治转型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

10. 杨光斌:《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比较历史分析》,载杨光斌主编:《比较政治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

11. 唐睿和唐世平:《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26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QCA的双重检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第39—57页。

12. 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第141页。

13. 目前发表的成果参见 Tianguang Meng, Jennifer Pan, and Ping Yang, “Conditional Receptivity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1, No.4/5, 2014, pp.1—35.

第一章

比较政治的方法综论

本章主要对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进行宏观的、整体性的讨论。第一节主要围绕萨托利的三个问题展开,即:为什么比较?什么可以比较?如何比较?在“萨托利三问题”的基础上,首先,笔者从归纳和控制的角度讨论了比较的基本逻辑;其次,笔者以求同法和求异法为例,讨论了比较对象的选择问题;再次,笔者在与实验方法、统计方法和个案方法比较的基础上,讨论了比较方法的特殊性和主要价值;最后,笔者对比较方法的两次浪潮进行了梳理。第二节主要对比较方法从单因解释向多因分析的研究转向进行归纳性总结。首先,笔者分析了经典比较方法中的单因特征;其次,笔者再从质性比较分析和原因分析等方法中总结出多因解释的特征;最后,笔者将多因转向与科学发展的总体趋势结合起来进行讨论。

第一节 比较方法的基本逻辑与学术史

比较方法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具有何种意义?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比较政治学科边界的界定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如何界定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边界,长期以来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用研究内容和领域来界定比较政治学。例如,一些经典研究都把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发展或政治发展研究等同起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比较政治学也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围和领域。²另一种认为,应该用比较方法来界定比较政治学。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和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就持这种观点。³这两种观点对于比

较方法的意义有不同的认知。前一种基本上把比较方法看成是展开研究的一项基本工具,而后一种则把比较方法看成是比较政治的核心和特质。笔者认为,不能将两种观点对立起来理解。如果一个学科既包括实质内容又有特殊的方法,那么这个学科应该会更加成熟。

不管如何,比较方法对于比较政治学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便比较方法对于比较政治学不是实质意义的,那它至少也应该是工具意义的。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国内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相对缺乏的。⁴在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国别研究是相对发达的,而能够真正进行比较的成果却相对较少。同时,在目前的比较研究成果中,有逻辑地真正进行比较的成果则更少。许多比较研究仅仅是对两国或多国情况的一个描述性讨论。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1991年的论文中提出三个问题:为什么比较(Why compare)?什么可以比较(What is comparable)?如何比较(How to compare)?萨托利认为,虽然比较政治研究在美国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史(到1991年为止),但是美国的许多比较研究者对这三个问题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三个问题是比较研究方法的三个元问题,而国外的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则主要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早期的经典文献主要针对前两个问题进行讨论,而最近的一些进展则围绕如何进行比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章将以这三个问题为中心,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一些经典争论和前沿进展进行综述。

一、比较的逻辑:归纳还是控制

关于比较的逻辑,实际上有“归纳论”、“控制论”和“折中论”三种观点。“归纳论”认为,比较的实质是一种知识的归纳。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劳伦斯·迈耶(Lawrence Mayer)等人。譬如,阿尔蒙德基本上把比较看成一种基本的科学思维方式。阿尔蒙德指出:“比较本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本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深化了我们对本国各种制度的理解。……通过考察我们所不熟知的安排和假设,比较分析有助于拓展我们对政治可能性的认识。”⁵从这个意义上,阿尔蒙德把比较方法看成是整个政

治科学的基础：“比较是政治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核心。”⁶ 迈耶等人直接把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看作是对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及其背景的归纳”⁷。这一观点也将比较方法看成是政治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对此，迈耶有一段表述：“就如我们所见的解释其实是一种归纳性活动的意义而言，比较分析可以等同于对政治的科学研究。”⁸

“控制论”则认为比较不能仅仅停留在归纳的层面，而应该从控制变异的角度来理解。阿伦·利普哈特、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和萨托利就持这种观点。在《比较政治与比较方法》一文中，利普哈特指出，比较方法与统计方法的科学逻辑是一样的，都力图实现一种控制。利普哈特认为，比较方法与统计方法的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而只有一点例外，即“比较方法处理的案例数量太少，不容许通过偏相关(partial correlation)来进行系统控制”⁹。利普哈特指出，实际上“统计分析也存在这一问题，尤其是当我们要同时控制许多变量时，我们很快就会‘耗尽案例’。如果可用于分析的案例很少，以至于无法把它们交叉列表以进一步建立可信的控制，那么我们就应该采用比较方法”¹⁰。所以，在利普哈特看来，在统计方法与比较方法之间不存在一条清楚的分界线，它们之间的差别完全依赖于案例的数量。

斯梅尔塞也特别强调在控制的逻辑下理解比较方法。¹¹ 在斯梅尔塞看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都是为实现控制而展开的。斯梅尔塞总结了三种不同的控制方式：境遇控制(实验法)、对形成后的资料进行概念的控制(根据分析案例的数量分为统计法、比较法和异常案例分析法)、借助于并不存在的资料进行控制(反事实推理和设想的实验)。¹² 斯梅尔塞把比较方法看成是对形成后的资料进行控制的方法中的一种。¹³ 斯梅尔塞认为，在托克维尔、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中，这种通过比较来控制的逻辑都是明显的。例如，韦伯在对东西方宗教进行比较时，实际上将两者共有的特点(如商人阶层的发展)看成参数，而把它们有所区别的方面，当作操作性变量对待。¹⁴

萨托利也持这种“控制论”的比较逻辑。在《比较与错误比较》一文中，萨托利在批评归纳论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对比较逻辑的理解：“因为所有的知识都在寻求一种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所以对于前述的‘比较政治解释论’，人们可能很难提出反驳的意见。但是，为什么要比较

呢？比较路径独特的地方又是什么呢？人们使用比较进行研究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控制。”¹⁵之后，萨托利又进一步分析和解释了比较的控制逻辑：“比较控制（comparative control）是控制的一种，虽然它并不是特别有力的一种控制。实验控制（experimental control）是比较有力的控制方式，而统计控制（statistical control）也可能会比较控制更有力些。但是，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存在其限度，而统计方法则需要非常多的案例。我们在研究中经常面临如利普哈特指出的‘变量太多、样本太少’（many variables, Small N）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最佳选择便是运用比较控制的方法来研究问题。”¹⁶

如果说“归纳论”和“控制论”几乎是针锋相对的话，那么另一种观点则尝试把两者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罗德·黑格（Rod Hague）和马丁·哈罗普（Martin Harrop）总结出比较研究的四点功效：第一，了解其他国家的政府以扩充我们的知识，为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引入新的视角；第二，通过比较研究改善我们关于政治过程的分类学知识；第三，比较研究能够使我们检测有关政治生活的一般性假说；第四，比较能使我们拥有预测和控制的潜力。¹⁷在这里，两位作者实际上采取了一种综合的态度，其前两点主要是归纳，而后两点则主要是控制。托德·兰德曼（Todd Landman）也把比较研究的功能总结为四点：第一，情境性描述可以使得研究者了解到国家之间的相似性；第二，分类研究可以降低世界的复杂性，并为研究者提供由经验性数据组成的资料平台；第三，比较研究中的假设检验可以通过对比性解释验证或帮助提出通则化的理论；第四，国家间比较以及由比较推出的通则化理论有助于预测未来可能的结果。¹⁸兰德曼与黑格等人的总结要义基本相同，只是表述不同。这两种观点可以被总结为“折中论”。

笔者基本同意将归纳和控制的逻辑结合起来理解。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归纳更多是政治哲学的逻辑，而控制更多是政治科学的逻辑。同时，因为比较政治学更多在政治科学的领域中，所以比较的逻辑应该更多地表现为控制。因此，笔者对比较逻辑的理解介于“折中论”和“控制论”之间，即尽管多数学者在实际使用比较方法时夹杂了归纳知识和控制变量两种不同的目的，但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比较的意义更多

在于控制而非归纳。

二、比较对象的选择

在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两国或多国某一问题领域的实证比较。在此,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比较对象的选择是否应存在某种逻辑?(或者:在选择比较的对象时,应该采用何种原则?)这个问题的回答与上一个问题关联。如果将比较仅仅看成是一种知识的归纳,那么比较对象的选择就可以在相对自由的范围内展开。就知识归纳的逻辑而言,相似性较高的对象可以比较,相似性较低的对象也可以比较。相似性是一个程度的概念,而任何两个事物都可以找到一定的相似性。假如仅仅是归纳知识的话,任何两个事物都可以进行比较,只是比较的意义有程度上的差别。萨托利曾问出两个经典的问题:“苹果和梨可以比较吗”和“石头和猴子可以比较吗”?¹⁹从抽象的意义上讲,这两组对象都可以进行比较。因为前一组对象都是水果,所以对这两种水果的功能、颜色、形状、味道等性状都可以进行比较。而后一组对象同样也可以比较。因为石头和猴子都是实体,我们同样可以对这两种实体的功能和性状等进行比较。只是后一组对象比较的意义相对较小而已。类似于后一组对象的比较在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并不少见。

如果从控制的角度来理解比较方法,那么比较对象的选择就成为一件非常谨慎的工作。这其中会有两种不同的逻辑。第一种逻辑是最大可能地选择相似案例。为了讨论的方便,笔者在这里将这一逻辑称为“相似案例比较”。这种逻辑在不同学者那里有不同的表述。最早对这一方法进行讨论的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密尔在《逻辑学体系》(*A System of Logic*)一书中将这一方法概括为“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密尔给出了该方法的理想状态:对如下两个案例进行比较,即一个案例中的两个因素(即假定的原因和结果)在另一个案例中是不存在的,除此之外两个案例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²⁰因为密尔“求异法”的条件非常严苛,所以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图纳(Henry Teune)在“求异法”基础上提出了